

1950 年上海失业工人救济问题

■ 张 犇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国民党集团当然不愿看到这一远东巨埠成为新政权的财源宝地,因此极尽骚扰破坏之能事。其主要手段有两种:一是封锁海岸,宣布自 6 月 23 日起在长江口布设水雷,并派遣舰艇封锁南自闽江口起北至辽河口的海岸线,企图将上海困死;二是轮番轰炸,自 6 月下旬至翌年 5 月,先后 77 次派遣各型飞机共 302 架次骚扰(侦察、散发传单)、扫射、轰炸上海,特别是 1950 年“二六”轰炸,导致军民死伤数千,难民数万,财产损失无计,全城停电,人民生活陷入瘫痪。当时解放战争依然在继续,国家预算无法平衡,财政赤字继续扩大,只能通过增发钞票来弥补缺额,这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而封锁造成的原料物资短缺更推高了物价,导致上海解放之后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四次“物价涨风”。1950 年初,中共中央打出组合拳,通过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提高税收的方式回笼货币并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统一财经的方式统筹政府开支,通过集中抛售的方式平抑物价,企图一举打破这一自抗战起延续达 13 年的上海通胀恶性循环,使经济社会回归正常。然而,这些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操之过急的问题,致使社会虚假购买力在短期内充分暴露,商业成交量迅速下降,市场低迷,商店大量关张,工厂资金链断裂,无法开工,并且不能给工人支薪,金融业呆账坏账骤升,私营钱庄大面积倒闭,以至

于使得 1950 年的春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第一个最困难时期。4 月份前后,这一危局达到顶点,毛泽东称之为上海“四月危机”。

面对萧条局面,资本家一方面表现出抽逃资本、减少损失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也有畏于政治压力,力图洗清自身,跳出剥削行列的矛盾心理。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停工、歇业的范围不断扩大,并且复工无望,在生产极度破坏的同时,产生了大批工人的失业问题。比较严重的有 4 万烟厂工人中失业及半失业工人达 3 万人以上,3.2



▲大公报关于救济上海等地失业工人的报道

万千余码头工人中失业者达1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每月也不过做几天工,可以说全部在失业状态中;店员及海员工人失业者各达2万人以上。纱厂、染织、针织、手工业工人失业人数均在1万多人左右;其他如造纸、火柴、毛纺、丝织、橡胶等行业,失业情况也相当严重。截止5月份,上海市失业工人总人数已超过15万人,连其家属在内受影响人数达50万人。

在早已完全商品经济化的上海城区生活,伸手就需要花钱,如果没有收入来源就意味着贫困。当时的工资发放办法,一般是“停工半给,开工照给,春节例假照给,但部分经济情况特别困难的也有仅给维持费,或工资照算而部分付现,部分记账,情形甚不一致”。即使发半薪,和正常情况下相比,工人的收入也已经大大降低了。当时上海全市有107万职工,除了51万公用事业职工、公教人员、公营百货公司店员外,其余均受到影响,尤其是纺织业、造纸业、机械制造业、面粉业、橡胶业和工人人数较多的卷烟、印染、化工、印刷等行业的共计36万工人,收入下降明显。其中有部分工人表现出“对生产的积极性”,能够暂时领取半薪或缓领奖金,或“支取少数维持费,将部分工资存于厂方”,以“平和心态”静等复工。如集中在徐汇区的100多家染织业小厂的1000多工人,每天仅吃两顿稀饭,等候开工。也有自动减薪的,如橡胶业某厂有200多工人同意暂时遣散返乡,“每人每月发米一担,先取两个月,以四个月为限”,争取工厂在四个月内复工后重返上海。

失业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很快就陷入了困境。以新生纱厂为例,全厂工人共938人,此时每日吃三顿粥汤者320户,吃两顿粥汤者85户。又如汇昶烟厂,有的工人每天



▲1946年1月22日,万余名失业工人在上海社会局门前请愿

只买3个大饼充饥,有的卖掉铺盖,吃尽当光,有的工人无法生活,甚至个别的把孩子送给别人。至于以豆渣糠粃、豆饼、野菜充饥者在失业工人中成为普遍现象。失业工人普遍情绪低落,变天思想严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各种极端事件发生了,有的卖儿鬻女、自杀,甚至铤而走险进行抢劫。这一危难局面给特务和犯罪分子提供了捣乱的机会,他们甚至采取半公开形式趁机挑拨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各种请愿事件层出不穷。例如,洋泾区周家桥一带地痞流氓、国民党党员,4月份煽动崇新纱厂部分工人,向市政府请愿游行,并煽动和参与启新纱厂、美光火柴厂、申新一厂殴打工会干部、积极分子,张贴反动标语等活动。4月25日上午,2000多名三轮车夫在坏分子煽动下,在昆山公园附近集会,企图向市政府分头请愿,后经公安局、劳动局、总工会出面劝说散去。仅4月25日至30日的6天内就连续发生16起聚众请愿事件,令治安部门和劳动纠纷调解部门疲于奔命。劳资矛盾迅速激化,并很快表现出过激行为,他们包围殴打资本家、在资本家家门口坐吃不走,打警察、捣乱会场,殴打工会干部,甚至工人互殴,给社会秩序造成

很大破坏。

4月,上海市将这一危急情形报告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决定用举国体制对上海的困难进行救助。4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拟定的救济办法如下:“由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工人本着阶级的同情友爱,于四月三十日(星期日)做义务工一天,以所得工资(或捐出工资一天)作为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具体进行办法由全国总工会另发通知)。各地必须严重注意这一工作的动员和准备,必须加紧事先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动员,以达到广大工人群众真正自愿自动地参加这个运动,不要有丝毫强迫命令的现象,使广大工人群众在这次运动中能大大提高阶级团结的觉悟。上项基金分配办法如下:东北收到的捐款应全部作救济上海失业工人之用,华北及山东各城市所得捐款,以一半捐给上海,另一半救济本地失业工人。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大行政区所得捐款,均作为救济本区大城市中失业工人之用。救济办法,除对上海拟作比较长期的救济外,其余各地均暂作一次的救济,其具体办法由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市委召集工会党组会议拟定之。”

除义务劳动捐献一天工资这一办法外,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市还号召解放军每个指战员捐助1斤米,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捐助1至2斤米,作为临时救济。虽然以上海当时的实际困难而言,需要长期救济,但当时上海和中央还没有确定救济方式,因此中共中央暂时指示上海市委,“对上海失业工人作临时救急,而不要规定永久的救济办法”,临时救济“大概以每个失业工人每个月的救济费不超过五十斤至八十斤大米为限,或开大锅饭给失业工人吃”。这一号召得到了切实贯彻执行,全国工人,特别是上海工人,“除全部捐出一日工资外,有的还捐了七八天工

资,甚至表示愿意每月捐助一天,直到上海经济情况好转,没有失业工人为止”。解放军和各机关的供给制干部们在这一捐助运动中走在前列,他们节省了津贴、菜金、米票、柴票来救济失业工人,驻沪解放军并以战绩展览会的全部收入来救济失业工人。其他方面也有用义演、义赛等方式来捐献的。工商界、民主党派与其他各界也都纷纷卷入这一运动。此次临时救济运动共收到上海市工人捐来90.6645494亿元,驻沪解放军和机关工作人员、文教人员捐来20.49237062亿元,上海市工商界捐来48.39258174亿元,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配套拨付救济金15亿元,东北工人捐来83.66051624亿元,山东工人捐来5.89亿元,全国总工会拨付各



▲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自筹救济基金缴款书

地工人捐款21.87164462亿元(以上均为旧币1元人民币合旧币1万元)。上海市内外捐款总额共计达285.37357016亿元。

上海市第一届第三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时,推派代表成立了“上海市失业工人临时救济委员会”,作为临时救济的组织领导机构。该会组织人力对失业工人展开调查和动员,协调他们到工会申请救济,对已经断炊的立即开展救济,“对于有条件回乡者,给以旅费帮助”;将部分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参加政治文化学习,提高其政治觉悟和劳动技能。中共上海市委出面向粮食公司暂时借支粮食500万斤,从4月21日开始,该会即着手对工人一面进行登记,一面发粮。6月

份按照初步登记展开普救,至8月16日止,共救济失业工人60606名,共发放救济粮849.98万斤。

在前期兜底式的临时救济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市于7月2日正式成立“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由陈毅任主任,刘长胜、马纯古、黄延芳任副主任,全体委员共40人。委员会下设救济处,朱俊欣、杨秉儒分任正副处长,下设办公室及登记、工赈、救济、教育、财务等五科,连同各级救委会,共计有干部1193人(大部分干部由失业工人担任,这也是以工代赈的待遇),负责实际救济工作。该会按照政务院颁布的“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展开长期的、系统的救济,救济方案以以工代赈为主,其他办法为辅。

在以工代赈方面,组织实施了翻修道路、疏通沟渠、埋设沟管、开河采石等大型市政建设工程,以及工人住宅区环境卫生改善工程,如当时市政第一大工程翻修淮海路工程就是以工代赈项目。参与工作人数由最初的每天231人整理园圃开始,到10月份时已增加到平均每天有13700人参加工作,半年共计完成79.7391万个工作日的劳动,建筑路面23万平方公尺。以工代赈工程实施过程中有很多矛盾,订立工资就是第一难事,因为工人熟练程度不同,以敲石工作为例,熟练工人3天可敲1方,每天可得8斤米,但一般工人30天,甚至50天才敲一方,每天工资不足1斤米。挖河、挑土等工作差异也较大,最终只能规定所有人都是试用,按照实际情况支取工资。由于以工代赈重在救济,工赈工资与单纯救济米数量差不多,所以很多工人情愿等在家坐吃。也有的受职业习惯影响不“合群”,如店员参加捞挖阴沟,开始穿纺绸衬裤、白皮鞋,受其他工友批评,后来都转变得非常积极,在阴沟中捞出

许多手枪、子弹、手榴弹等都献交政府。此外并有许多参加以工代赈的失业工人超额提前完成任务,受到了奖励。

在生产自救方面,半年内协同产业工会救济机构组织了军鞋、皮鞋、橡胶等大小25个生产自救工厂。其中承包了三野的军鞋10万双,是该项目的主体内容。最多时吸收了9109人参加工作,12月份由于军鞋工作结束,逐渐减少到3162人。这方面成功的典型案例很多,如“安琪儿奶粉厂”,由于资方逃跑,经救济会向该厂贷款1000万元,协助工人自主维持经营,结果盈余约5000余万元,不但归还了贷款,还捐出500万作为失业工人救济金。资方看到有利可图,又回来复业。其他各参加生产自救的单位,大都能做到保本自给。

宣传教育方面,半年共组织失业工人参加政治学习的16071人,参加文化学习的为7112人,参加技术学习的为3664人,生产自救工厂工人参加学习的计407人,共计27254人,占全部登记失业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

资助回乡方面,到12月底,总共动员2600名工人和2200余家属回乡,由于失业工人中大多久居上海,加上前一年苏北灾情严重,因此这项措施虽然经过多番宣传引导,但所起作用有限。

通过政府出面主导的失业工人及其家属的救济,使受助对象减轻了生活困难与失业痛苦,尤其是以工代赈项目,一方面使工人获得了救济,另一方面也有益于市政建设,失业工人通过劳动也学会了技术,为其创造了转业的条件,影响上海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也在紧张的救济中消弭了。

(作者系甘肃省平凉市委党校讲师)
责任编辑 姚胜祥